

文学名刊
新作扫描

《花城》《广州文艺》《作品》《青年作家》:

立足南方,与时代、青春对话

《花城》《广州文艺》《作品》《青年作家》地处南方,尤其前3家位于广州,这使其既能敏锐捕捉时代新质,反映现代人的精神向度与生命褶皱,又注重南方文学地理的建构。已出版的2024年第1、2期,有对人工智能、女性写作等文学热点的关注,历史的现代重构与人性质询,城市浮世绘的现代性反思,更有对地方经验的多维叙述。地缘性特质也使刊物在聚焦名家的同时,颇为重视“90后”“00后”新人的挖掘与扶植,偏重本土作家作品的推介,又有着加强边缘与中心、地方与地方多元对话的潜流。

机器与人、文学关系的文化反思

伴随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的发展,人的机器化、生命物化及智能伦理等问题日益突出,探讨机器与人、文学的关系,成为当代文学的热门话题。《广州文艺》第1期袁远《无字信》描摹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这一社会热点,展开对网络时代人的生命物化、异化的文化批判,以老胡的报纸投递员身份,面对订户数量的锐减,在回溯传统纸媒昔日荣光的同时,表达在媒介革新中传统纸媒时代宿命的叹惋与怅惘之情。第2期再正《南门桥》是一个有关理想、道德的故事,亦关涉手机对人的控制。谢爸爸喜欢刷抖音,尤其住院后其占据了打针吃药外的所有时间。手机极大地吞噬着我们的生活,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,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。

作家访谈是重返文学场、审视文学变迁与时代震荡,重新发现作家、作品的重要途径。《作品》《青年作家》第1期“头条”分别发表了刘心武、张平访谈录。针对自己的写作越来越边缘化,刘心武坦然“被边缘化,我无所谓,边缘就边缘,边缘也有光嘛”。电视、网络的崛起改变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,人们的阅读从传统纸媒转向各类音频、视频,刘心武在强调要从“母语”中寻找创作资源的同时,谈及为何上《百家讲坛》讲解《红楼梦》等问题。在张平看来,为老百姓写作是作家的基本立场,要关注重大的社会现实,得民心者得天下,而手机作为当今社会无法离弃的大众产品,正改变着我们的交往与生活方式,文学必须要书写这种变化。面对AI时代作家的存在危机,他认为流行作家,要行文学作品的社会现实,得民心者得天下,但独创性作家被替代的可能性很小。

时代的精神镜像与南方叙事

李修文专栏的长篇《猛虎下山》(《花城》第1期),钩沉90年代工人下岗的生存困局,并融历史反思与人性质询为一体,透视人物被权力规训的

自我,直抵人的物性本能。陈继明《霍克兄妹》(《作品》第1期)也经由两起种族暴乱,凸显强权对人的奴役与异化,展现人性“恶之花”。《青年作家》第1期张新祥《岁月飘过糖子寨》以过去与现在回环嵌套的复调叙事,展开“他人即地狱”的存在哲思;张宇东《幸牲》通过屠夫李果从杀猪到杀村长的戏剧性反转,体现出权力宰制下小人物的悲苦与无奈。石舒清《故里三录》(《作品》第1期)的《大白菜》《高树义》《演员狗》,撷取日常生活中离奇的罪案与死亡,以黑色幽默的笔调勾勒现实的荒诞。《广州文艺》第1期的赵剑云《过尽千帆》亦以罪案和死亡结构全篇。弟弟之死彻底改写了月怡的人生,时隔十年凶手落网,但轻舟已过万重山,她终于迎来新生;韩东《太平洋、太平洋》中小欧意外去世,作为朋友的“我们”却发现对他知之甚少,其追悼会又促成了“我”的婚姻,“如果不是你的死,我们是不会在一起的”。这句每年扫墓时例行公事般的话,从感怀到悔恨、怨怼的语意变化,也尽显荒诞怪诞的人生底色。

马笑泉《圣贤》(《作品》第1期)通过文旅兴市中的文庙改建,再现传统与现代、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与碰撞,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。《广州文艺》第2期尹向东《无法靠近》,有对城市文明建设中流浪狗无以为家的悲叹,亦有温馨的人狗深情,最后狗因护主心切被击毙的结局令人唏嘘;于坚的诗《有个下午》以现在时态回望过去的人与物,呈现家乡的时代新变。冯昱《听从一只乌鸦的话》空巢老人及家庭伦理。田兴家《蝴蝶与战争》(《青年作家》第1期)中,作为苗庄最后的苗王,姜央以一己之力做困兽之斗,终究难挡族群文化与历史衰落的时代宿命。

四家期刊都地处南方,呈现出南方独特的文化、精神地理。《花城》第1期邓一光《那块地》,以“我”与一块地的关联,勾勒出改革开放后深圳蛇口的发展剪影。《广州文艺》第1期梁晓阳《凤凰单车大链饼》讲述了一个因父辈权力争斗夭折的乡村爱情故事,是一部八九十年代的乡村青年进城记。粤语方言的使用,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南方特质;陈启文散文《一个人,或一座偶像》掘进历史深处,在追溯韩愈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过程中,解码潮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第2期中篇小说专栏的弋铎《草垛外的莫奈》、李东文《托尼所了解的女性》,以深圳、佛山为叙事场域,描绘城市异乡人的存在之困。“新南方论坛”第1、2期邀请黄平、行超、李唐等人,就新南方新东北、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等展开“南北对话”。

新锐作家的青春叙事及女性写作

在聚焦名家的同时,各期刊也注重对青年作

家的培养和扶植。《青年作家》第1期“新力量”专栏推出“00后”俞生辉。《渔王》《桂圆》叙写小镇青年的青春成长;《秘密》以相亲为切入点,探勘现代人孤独、空寂的精神向度,叙事较为成熟。徐福伟在“主持人语”中将3个短篇视为其“从脱轨的青春到无处安放的灵魂”的叙事路径突围。“突围”栏目发表的“90后”渡澜短篇《走亲戚》,有着鲜明的先锋特质。孔拉丰在父亲的带领下出国看望奶奶,但孩童的限制性叙事在呈现剑拔弩张的母子关系时,始终疑云重重,从而营造出一种怪异、悬疑的叙事氛围。《作品》第1期“超新星大爆炸”专栏推出“90后”王幸逸。其小说题目颇为典雅,用词考究,擅长古典意蕴的现代重构。《登仙》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,在虚实之间勾勒缺少少年的成长。《异闻》是对《聊斋志异·长清僧》的改编。《胧月夜》以美国记者“我”对A级战犯尾崎谍谍生涯的探访,揭开日本反战人士的心灵苦楚。《罗马玫瑰》《忽闻歌古调》叙写都市男女的爱情与欲望。《广州文艺》“后浪起珠江”栏目第1、2期发表的“90后”梁豪《碗》中,葛多手腕的疼痛是分手后心灵创伤的外在显现,这既关乎其对女友的暴力伤害,更与其对父亲精神抗拒的失败密不可分;叶端《七月》聚焦时下的流行话题“妈宝男”。此外,第1期有予《我们往哪儿走》描绘都市爱情,勾勒现代人的情感隔膜与心灵孤寂;温文锦《幻鱼》以主人公的梦境和幻觉、鱼颜色的变化隐喻人的异化。

《花城》则开设“新女性写作”专栏,推介青年女作家,关注女性写作新收获。主持人张莉指出,新女性写作的意义是“跳出受害者思维,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,写下一个个独立的人,也写下万千如她们的我们”“直面女性的生存”。第1期发表的“90后”杨知寒中篇《慢回身》,以丈夫李旭东的辞职开篇,逐步揭开“我”的多副面孔、夫妻隐秘的情感裂痕;三三《上海女郎(2003-1)》通过“我”的他者视角,呈现小曹的情感遭际与人生蜕变。“我”对她自愿屈从于丈夫,用自身豢养着周围的一切,以致无法看清其真正需求的发现引人深思;蒋在《许多》中的阿芳向往诗与远方,最终却回到家乡,与传说中来自台湾的史斌结婚,并在其中风后扛起生活的重担。除专栏外,《青年作家》第1期发表的王一三非虚构作品《河对岸的父亲》,经由父亲的离家描摹母亲的坚韧、果敢;万萍霞《痛痕》以刘小月、冷珊互为镜像的婚姻悲剧,呈现出打工女性无处申诉的心灵秘史。

(本文为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的讨论成果,参与者为:刘志珍、孟继燕、曾嵘、林楷斯、许哲煊、邱文博、邱雯意、张昀菡。刘志珍统稿,指导老师申霞艳)

文学名刊 主编谈

批评的呈现方式,代表着编辑的价值观念和学术理路,其中所包孕的定位和倾向本身,就意味着对自我及世界的辨认,意味着学术公器及其价值输出得以最终实现的精神操持



编辑就是批评

曾攀



我给自己的定位是,我首先是一个编辑,然后才是一个从事评论工作的青年。自称青年人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应流于陈腐,也务祛世故和油滑,因为如此会游离于真问题与真自我之外。而之所以强调编辑身份,一方面是职业使然,这样的工作琐碎却不平凡,往小里说,显影的是个体沉潜的耐心,大则关切持守和职责;另一方面于我而言,编辑不仅是从事评论工作的一种准备,或一重视镜,更是关乎学术批评与研究的志业。

作为学术期刊的专业型编辑,与一般意义上的文艺评论和学术研究不同,尤其我供职于注重学术前沿与当代批评的《南方文坛》,这是一本创刊于1987年、并于1996年改版的有着深厚批评传统的学术期刊,享有“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”之誉,也因为张燕玲老师20多年来通过专栏“今日批评家”等,始终坚持对青年学者和评论家的扶持,而被称为“青年批评家的摇篮”。作为这样一本知名文论杂志的编辑,不可避免地常常置身于当代文学与学术的现场,或被裹挟于种种“当代性”的漩涡之中,这其中有些,也有迷茫,众声喧哗也更容易目眩神迷,更多需要付诸心神,拿出眼光,批评、辨析,判断学术的发展方向,廓清并梳理作品和现象的质地、动向,于价值之有无、意义之深浅中做出剖决取舍。细细想来,这与批评的理念或有异曲同工之处,因为编辑的理解、判断、阐释能力关乎对当代学术与批评现场的感知,而文论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,无疑有助于推动文艺思潮与学术概念及话题的深入和发散。

因此,甘于沉潜而富含锋芒,无疑意味着一个文论期刊编辑的优良质素。毫不隐晦地说,编辑是作嫁衣者,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服务性,这并不代表什么,也许每一个职业本身,都具有自身的主体性与对象性。但无论如何,久而久之,编辑已成为我从事批评的一种底色,甚至意味着某种精神的装置。

众所周知,《南方文坛》自2021年举起旗帜倡导“新南方写作”,引发了当代中国新一轮地方性书写的浪潮,这是学术期刊编辑自觉的、有意识的策划,旨在形成具有系统性与理论性的探讨。作为“新南方写作”最重要的推动者,在张燕玲老师身上,有我们不具备的品质。其中可以见出包含着文艺理论及创作的学术内蕴、前沿课题的概念,通过显在的具有专业而敏锐的编辑参与,推动了符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状况的文学理论创生。不得不说,这是杰出的编辑与生俱来或长期累积所获致的前瞻性。

二

由此可见,好的编辑,是引导者或引领者,能为文学及其批评开辟一种场域、一个阵地。当然这里除了少数的学理显明且具既定理论立场的刊物——事实上“同人”之间也常常充满差异性乃至对抗性——更多的不是异“口”同“声”,而是汇聚其名与容纳声音,是兼容并包。如此体现在文论期刊的每一个显豁或隐微处,当然前提是编辑在用心做杂志。一段时间以来,《南方文坛》更加集中地对当代前沿的课题,持续推出

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

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

评论

《群山回响》:

青山千村奏响新时代美好乐章

丁晓原

“我用脚步丈量山区的这片土地,认真搜寻山区人民一个又一个细微而感人的故事,感知乡村追求共同富裕带来的巨大变化,解读浙江山区‘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’‘千村精品、万村美丽’‘千村未来、万村共富’这一不断迭代升级的民生工程的文化基因和成功密码。”这是李英在其新作《群山回响》“引子”中的一段引言。如“引子”所示,该作题材旨关连着乡村,是作者乡村书写的拓展和深化。从某种角度而言,我们可以说李英是一位“村子里的作家”,乡村是他深挖的一口非虚构创作的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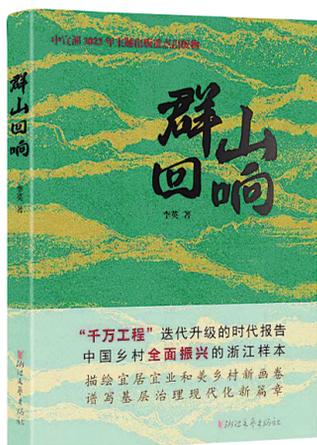
报告文学作为一种“时代的报告”,其时代性的取材和主题表达,是其题中应有之义,也是其价值生成的关键要素。

《群山回响》取材的是浙江“千村示范,万村整治”工程(“千万工程”)的伟大实践,摄取的是新时代浙江新乡巨变的美好画卷。千村万户合唱新乐章,青山绿岭弹奏进行曲,作品回响在读者耳旁是一种欢欣激昂向未来的时代之声。经过多年的系统实践和接续奋斗,“千万工程”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“三生”(生产、生活、生态)引来的“三美”(建设美丽生态、做强美丽经济、创造美好生活),使浙江乡村面貌焕然一新,生机盎然。《群山回响》是对“千万工程”所作的具有覆盖面也有深度的书写,而其意义也正关联着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宏旨。作品所写关涉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现代化建设的等,是一部言之有物、内涵丰富,具有沛然时

代气象的报告文学。《群山回响》事关“国之大事”,但作者的写作并没有直奔主题,以概念化的宏言大语演绎时代议题,而是通过展示特定物象、讲述独特故事、描写个性人物,敲出属于浙江山村的“回响”。作者注重的是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,支撑作品的时代主题表达。全书20多万字,共分为五章。细读作品,我们可以发现“变”是其中叙事的重要关键词。“变”实际上给出的是叙事的历史维度,远去的灰色历史背景彰显出的是壮美绚丽的新的时代。作者注意将山村置于当代历史的流脉中加以细察端详,通过山村前后的鲜明对比,具有可信度地写出了它的历史性巨变,以历史性的生成凸显出对象时代性的建构。路是山村脱贫致富的制约性因素,因此《群山回响》将其作为叙写的重点之一。“在浙江的大山里,许多农民隔居偏僻的村落,他们曾经被大山阻隔,曾经为大山所困”。路的故事中写满了过去山民的艰难和苦涩:“一担进一担出,牛肩头驮骨和泥”。“油盐酱醋都要翻山越岭到山下镇子里去买,每次都要挑着担子起大早出门,晚上披星戴月地回来,一走就是一整天。”更有令人肃然起敬的“愚公移山”开路建桥精神壮志的特写,“他们曾经付出过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奋斗,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”。如今不仅班车可以直达县城,而且还迈进了“高铁时代”。“路通则兴,路畅则富”,山村振兴进入了快速路。作品不仅真

实展示了令人欣喜的山乡巨变的美好景象,而且还深挖创造历史性改变的伟大力量。这种力量除了大时代的原动力之外,更有山村人民渴望美好生活的不竭内驱力。作品用不同笔墨描写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山村干部和普通百姓,叙写他们的业绩事迹,也刻画他们的精神性格,是个体生命的塑像,更是集体精神的刻录。“我们横路头村的精神就是一件事、一条心、一起扛、一直做、一块拼、一定赢。”《群山回响》回荡的正是山村人民齐心协力开新篇的精神交响。作品尤其可喜的是给出了新山乡巨变中的青年力量。“山中青年”有的开启了山村的“创客时代”,有的打造“龙游飞鸡”的品牌,带领山民脱贫致富奔小康,有的则实施旨在“绿色发展、生态富民”的“我的幸福计划”。以山民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,这些“山中青年”的叙事,让山村可持续更美好的未来可期。

除了时代性、历史性特质以外,流溢在《群山回响》作品中的是它的文化韵味,由此生成其鲜明的文化性。文化性不仅可见于作品对山村历史背景、历史人物、历史遗存等的叙写之中,而且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还在于对山村文化现实创造的摄照。文化润山村,也可兴山村。作品通过具体的文化叙事,写出了乡村振兴中山村文化创造的多重意义。“父亲的水稻田”就是一个颇有意味和情趣的文化创意。这是策划实施者“稻长”“写给城市的稻米书,也是写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的父亲的散



《群山回响》,李英著,浙江文艺出版社,2024年1月

文”。“父亲的水稻田”只是一块纯自然的袖珍型普通水稻田,但它不仅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,也成为许多“稻友”躬耕体验的热土。水稻土所“导”出的意义在于它留住了乡愁,呈现了农民劳作价值,“它以农耕文化为契机,联通了农村与城市”。这样的文化叙事相对于修路建桥、特色产业发展的书写,显得有一些“柔软”。但柔软的导入不仅带给读者闲逸趣,而且刚柔相济正是山村之美的要素所在。

(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)